

A realistic oil painting of a wo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large, dark-rimmed glasses.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The entire portrait is framed by a thin gold border.

女总统

——科拉松·阿基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女总统

—— 科拉松·阿基诺

童年，青春，爱情，贤慧的家庭
主妇，国家元首。

奇迹般地把国家引上了新路。

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处理国事……



吴壬林 李秀芬 胡洁 译

吴良健 译校

乔治·布雷齐勒

纽约 1987 年 2 月版

责任编辑：罗 溪

封面绘制：张延宁

女 总 统

——科拉松·阿基诺

露西·科米萨 著

吴壬林 李秀芬 胡洁 译

吴良健 译校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9 12/16·插页 2

字数：197,000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5,500

ISBN 7-207-00557-1/K·47

定价：2.90 元

序 言

这不是一本授权写作的传记。科丽·阿基诺谢绝接见我，并指示她的兄弟姐妹们不要同我合作。为科胡昂科家族(Cojuangco)约定新闻记者会见时间的官员解释说，“她正在写自己的书。”

她的兄弟乔斯·佩平·科胡昂科最后同意接见我，因为他是靠自己的能力成为政治人物的。

某些政府高级官员、随从人员和总统个人的朋友们对我很有帮助；其他一些人包括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不愿意接见我。阿基诺家族中人员的态度极为合作。我还同在这出戏中的主要角色如前国防部长胡安·彭斯·恩里莱和马尼拉大主教卡迪纳尔·辛谈过话。当然，还有十几位为本书提供实质性的资料，包括称她为“政治夫人”的那些人；与尼诺伊一起蹲过牢及在军法管制那几年与科丽站在一起的那些人；在向马科斯挑战时与她一起战斗的反对派人士；掀起革命帮助她登上总统职位的那些人；找机会使她垮台的军人和保卫她的军人；左派和右派的领袖们；商界、工人、农民和教会的代表，以及我的同行菲律宾和外国新闻记者。

菲律宾是一个不拘礼节的社会。在报刊和公共场合，人

们都习惯地称呼教名的爱称。为了具备这种感情，本书遵循那种范例，也称总统为“科丽”。这个名字在她的国家里，实际上人人都知道。

本书的引语和事实来自广泛搜集的资料，包括访问、报刊、书籍以及本书作者自己的经历。这里描写的关于科丽的感受和思想决非杜撰，而是取自她的评论或者采访。

科丽·阿基诺是个实实在在不寻常的领袖。由于丈夫被暗杀，一下被推上现在的岗位。她缺乏经验，也没有传统政客的思想形式。她虔诚地信仰非暴力与和解，使她在相信政治必须由武力实现的男子统治的世界上成为突出的、与众不同的人物。菲律宾社会由于暴力而四分五裂——由于军阀、游击队和军队在内战中相持不下产生的政治暴力；和由于社会贫困，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富有者则深居于高墙之内而引起的社会暴力。尽管科丽·阿基诺经验不足和难以避免犯错误，如果她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处理那些问题，她将不仅为她的祖国的幸福，而且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如何工作的新的世界观点作出贡献。

露西·科米萨

纽约市

1987年2月

目 录

序言	1
谋杀	2
童年·初恋	12
骚乱的根源	18
尼诺伊	32
反对党	59
候选人	70
竞选运动	92
选举	111
二月革命	125
总统宝座	149
面对军方和叛乱者	168
马尼拉饭店事件	181
和平谈判	196
经济	209
政治游戏	219
炎热的秋天	225
上帝拯救女王	253
流产的政变	272
胜利	295

科拉松·阿基诺

谋杀

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经过从波士顿到洛杉矶再到新加坡的七天旅行后，于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搭中国台湾航空公司 811 次班机从台北起飞跨越边界到马来西亚，折回新加坡到香港，最后又回到台湾。他所以走兜圈子的路线，部分是他想拜会东南亚各国的官员，阐明他回国的目的，同时也希望震动一下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保安人员。

马科斯政府拒绝延长阿基诺为期二年的护照，这是他一九八〇年放逐出国时发的。极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有一张中东假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为马歇尔·博尼法西奥，“马歇尔”影射军事管制法，根据这个法令导致他坐牢七年半，直到一九八〇年。“博尼法西奥”影射军营，在那儿他因为是反对马科斯统治并向之挑战的主要人物而被囚禁。

他有时用这张护照，有时又用一张菲律宾护照，这是他在政府中工作的朋友代他弄到的，那张护照上填有他的真名。但是保安人员监视他的每一步行动。

他的夫人科丽留在马萨诸塞州牛顿，住在波士顿郊区。在回国途中，他每天打电话给她，电话里他们祈祷，读一段圣经。

在台北，他接到一个从马尼拉打来的电话，告诫他切勿回国。他把这次电话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他的妻弟肯·卡希瓦哈拉，他妻弟曾在台北遇见他。但他没有说电话是谁打来的。

八月二十日的大部份时间用来同新闻记者谈话，他们是来此陪同他作最后一站旅行的。第二天上午七时，他给科丽打电话，在谈话中，科丽告诉他，武装部队陆军上将费边·维尔警告各航空公司，不准尼诺伊下机，不管哪家公司带他入境，必须把他带出国境。尼诺伊争辩说，因为他是一个菲律宾人，他更可能被捕押回博尼法西奥堡。他告诉她，如果她能取得护照，在回国前带他们三个较大的女儿去欧洲旅行。科丽给他念了一段圣经。他又同他的孩子们讲了话，他哭泣起来。打完电话，他又给每个孩子写封信。

而后他去机场乘上午十一时飞往马尼拉的班机，在波音767飞机上，他发表谈话回答问题，在飞机上走动，同人们握手，谈到他预期的欢迎情形，闲谈笑话并告诉摄影记者赶快拍摄，不然几分钟后，一切事过境迁。他看一遍准备在机场发表谈话的讲稿。他将说，他回去不是为了对抗而是寻求一种真正的全国和解。

他知道死刑在等待着他，但是他愿引用甘地的话：“无辜者甘愿牺牲是对专横暴政的最有力的答复。这是上帝和人类构思出来的。”他提出警告，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叛预示将爆发为流血革命，许多菲律宾青年已经意识到，自由不能赐予，只能争取。他要促使全国人民理解，全国的和解和团结只有在正义下才能实现。

“颠覆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不可能单纯用武力解决。”他说，“颠覆不能用加强镇压来遏制，只能用比较平等的分配财富，较多的民主和较多的自由才能避免。”

尼诺伊期望他的还乡有热烈气氛和隆重场面。反对派领导人已经要求左派集团的合作，后者能召集人数众多的游行示威，但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认为尼诺伊必定已经同马科斯达成协议，而他同美国人以及美国情报局也有关系。

因此温和的反对派（尼诺伊是其中一分子）把群众用汽车从远处运来欢迎他。

三万人在现代化马尼拉国际机场停车场等候尼诺伊。其中许多人系着黄色绸带或身穿黄色衬衫，这是还乡的标志，这种标志是根据为这个获得自由的囚徒而谱写的歌曲撰取的。歌词是“把黄色绸带环系在橡树上”。尼诺伊要求在他向群众讲话前，先会见五个人：他的母亲奥罗拉·阿基诺、最小的妹妹泰茜、以及反对派领袖萨尔瓦多·多伊·劳雷尔、弗朗西斯科·索克·罗德里戈和洛伦佐·塔纳达。他们和其他反对派的领袖——前众议员和参议员——都等在贵宾室。他们无法来到停机坪，机场内门都上了锁。

劳雷尔提给阿基诺母亲一张要求人身保护权的申请书，请她签上名。他们预料尼诺伊会遭到逮捕，而劳雷尔的法律办公室已准备了这个提交最高法院的文件。

在飞机开始下降之前，尼诺伊走往休息室，在他的奶油色的狩猎式茄克衫里穿上防弹背心。他告诉卡希瓦哈拉，“我们一着陆，勿忘去我家，叫人把我的东西送到监狱交给我。”

飞机在下午一点后着陆，滑行到八号门。几分钟后三个穿卡其布制服的士兵登上飞机。一个士兵属于菲律宾警察部队，另外二个属于航空安全指挥部。那两个航空安全指挥部的士兵，执住尼诺伊的胳膊。

“我们到哪里去？”他问。

“下飞机，先生。”

卡希瓦哈拉说，“我是他的妻弟，我是同他一起来的。”

“坐在你的位子上，”航空安全指挥部的一个士兵说。当尼诺伊和士兵一同走出机舱，在机上的新闻记者冲向机门，但是他们被身穿白色豪华的泰加洛恤衫（菲律宾传统绣花上衣）的人挡住。

尼诺伊和押着他的士兵走上旅客通道一端的金属平台。他们却不走向候机室，而是带他走下通道边上的梯子。几个穿白衣服的人挡住门，因此记者们不能跟着下去。当他们走下机梯时，两个穿制服的军官分别在他两旁，两个穿便服的士兵跟在后面，而且还有两个站在机梯的高处。在机梯底下，警卫和地勤人员得到命令离开机梯。

突然尼诺伊后面的一个士兵用全国通行的泰加洛语喊道，“他来啦！”

另一个说，“我来干，我来干！”

然后听到“开枪！”

十一秒钟以后，他们离开飞机。其中一个士兵急速转身把枪对着尼诺伊后脑勺勾动扳机。尼诺伊向前扑在跑道上。几秒钟后，又响了四声枪声。

尼诺伊躺在地上，鲜血从他的头部和颈部流出。躺在他

旁边的另一具尸体是一个身穿机场蓝色地勤人员服装的男子。后来认出此人名叫罗兰多·加尔曼，三十三岁，是个有名的强盗和职业杀人者。政府将控诉此人为共产党员射击手，他暗杀了尼诺伊。

架他下机的士兵和穿白色衣服的人不见了。其他士兵从航空安全指挥部停在附近的蓝色货车中跳出，开始猛烈地向加尔曼开枪。两名士兵把尼诺伊的躯体投进车里，这辆车子全速驶出机场。

当局没有告诉等候着的尼诺伊母亲和亲友发生的事情或者他被送往哪里去了。卡希瓦哈拉告诉他们尼诺伊被枪杀，但是他不知道他已死去或还活着。他们到附近巴克拉兰教堂祈祷，而后回家。当他们听到广播时，他们才知道尼诺伊已经死去，他的尸体被送往博尼法西奥军营的军人医院。他们去医院，同门岗争论，步兵把枪指着他们的头部，直到最后允许他们进入军营和医院。

到医院来的唯一高级政府官员是国防部长胡安·彭斯·恩里莱。当他见到前面流血的尸体时脸部显得惊讶。马科斯请恩里莱决定该把尸体送到哪里去解剖，要谁在场。

在牛顿，科丽不能入睡。她在等待尼诺伊的电话。从凌晨一点钟到下午一点的菲律宾的电话——她念玫瑰经。

凌晨二时半，科丽最大的女儿鲍尔茜接到电话，是由纽约基奥多新闻通讯社打来的。

“我要同阿基诺夫人讲话，”那位新闻记者说。

“对不起，她入睡了，”鲍尔茜说，“能把消息告诉我吗？”

“我想证实一下我听到的消息，阿基诺先生被枪杀已经死亡。我得到的来自日本、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消息有矛盾，我希望核对一下，谢谢你。”

科丽醒来问电话是怎么一回事。

“妈妈，他们说有人在马尼拉机场被枪击，他们认为这是爸爸，他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消息。”

科丽接通电话，记者重复前言，“我们从东京得到消息，你的丈夫被枪杀。”

“你能确定吗？”她问。

“是的，”并问她听到这个消息没有？

“没有。”科丽答。

合众社和美联社很快打来电话。但是这个家庭还不承认尼诺伊已死的事实——他们希望伤势不是致命的——直到他们的朋友日本国会议员石原信太郎从东京打来电话。他说，他看到血从尼诺伊头部迸流出来。

科丽告诉孩子们这个痛苦的消息。他们大家哭起来。她告诉孩子说，他们的父亲死了还好些，不然长期囚禁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更不好受；他曾常说到他决不愿这种事情发生。而后她说，“让我们来祈祷吧，因为除此我们没有别的事可做。”

一会儿，她二十三岁的儿子诺诺伊，在堪布尔新闻网电视广播中看到暗杀的报导，他整个晚上探听消息。

日本总领事井口武男是科丽家的亲密朋友，到科丽家慰问并提供帮助。清晨三时半其他朋友打来电话和来科丽家。科丽和她的孩子们在上午六时去教堂，回到家接到更多的慰

问电话，并向前来的新闻记者谈话。那天稍晚时间，她接见四家电视台的访问，并与众多的报刊记者谈话。

她打电话到马尼拉她的家，并问，“人民知道了吗？”她怕新闻检查封锁尼诺伊死亡的消息，她觉得毕竟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他们离开了祖国，他们的朋友不多。当她的姊妹告诉她许多人民都去瞻仰遗体时，她既惊讶又稍得宽慰。她问她回国后，她和孩子们能有一段时间和尼诺伊单独在一起吗？

科丽搭西北东方航空公司班机，从波士顿经过二十四小时精疲力竭的旅途，于星期三晚上八时二十五分到达马尼拉。一个细长的五十岁的妇女，头上短短的卷曲的黑发，她带着眼镜的圆脸，有一种混合着中国——西班牙——马来亚祖先的容貌。她和五个孩子及前菲律宾国会议员欧纳斯托·马塞达一起到达，后者是反对党的领袖之一，他同尼诺伊在放逐中是亲密的朋友。她没有显出多少悲哀的情感。她首先到福布斯公园去看她的母亲多纳·梅特林·科胡昂科，而后回到自己的家。这是一座朴素单层的木结构房屋，座落在泰晤士街中层阶级居住区，她曾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年。

数千名哀悼者等候在屋外，前来瞻仰遗体的人排了二英里远。第一批高级外交人员来吊唁的有美国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他同马科斯的关系极为密切以至反对派人士称他为“阿马克罗斯”（意为密友）。工人白天要去上工，他们在晚间或早晨前来瞻仰。科丽看到这样大规模的群众，看到人们对尼诺伊表达的爱，使她的悲哀略有减轻。

室内房屋为来访者整理干净，尼诺伊安睡在棺木里，仍然血渍斑斑，脸部有明显的伤痕和一个被子弹打穿的洞孔，子弹

穿过他的下颚。他穿着的还是他被打倒在地时的那件血衣。他的家属确信那些士兵在货车上又打了他，直到确信他已死亡为止。他们没有叫人把他的尸体洗净并另行穿衣，因为他的母亲多纳·奥罗拉坚持，“我要菲律宾人民看看，他们对我儿子做了些什么。”

科丽俯身向尼诺伊低声地说，她将继承他的事业直到这个国家有自由和民主。她没有考虑她所说的话包含些什么意义。当她吻他时，她感到他在对她微笑。她的女儿们告诉她，她们也同样感到他在微笑。

那天晚上，科丽在草地上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接待等在屋外的新闻记者。当科丽向记者们讲话时，两次止不住哭泣。她告诉记者，尼诺伊常说，勇敢象懦弱一样有感染力。她说，“如果你们中有一位、二位或三位能在此刻显示勇气，别人也会跟上来，对于尼诺伊的真实理想，也会出现同样情况。”

三万人到阿基诺家向尼诺伊致敬。马尼拉大主教贾米·卡迪纳尔·辛来到她家为遗体祈祷并向家属慰问。最后家族决定把尸体送往圣多明戈教堂（他家族所属的教堂），使公众便于瞻仰。从她家到教堂有几英里路程，一路上形成一支庞大的进军队伍。

科丽走在行列的前面。当队伍通过这一地区的主要商业街道，经过办公大楼、饭馆和住宅时，人民陆续参加进来。其他人排列在路旁。那天，约有五万人目送尼诺伊遗体运往教堂。他们赞美他的名字并唱《我的祖国》。这首民族主义歌曲已成为反马科斯的挽歌。

遗体庄严地躺在教堂里。科丽曾把他运到塔拉克。该地是尼诺伊的家乡，在首都以北六十公里的种甘蔗地区，在那里作了两昼夜的弥撒和祈祷。来到这个小小的外省市镇瞻仰遗体的约达十五万人。当四十五辆汽车长队送遗体返回马尼拉，路经中吕宋三省市镇时，有几万人站在公路的两旁。科丽见到有这样多的人而感到惊讶，人们在烈日下等候几小时，就是为了看一眼尼诺伊的柩车。

她谢绝反对派领袖们将遗体送往国内重大城市以激励民心的建议。她说，尼诺伊已完成他应尽的责任，让他安息吧。家属也很疲乏了，把遗体到处巡回，在供应等工作上也有困难。

葬礼在尼诺伊死亡十天后举行。早在凌晨五时，人民就到圣多明戈教堂等候上午九时的仪式。科丽站在教堂半圆形后殿高高的拱顶下，镇定而平静。她看到数千群众挤满了一排排黑色的木凳上。她告诉哀悼者她最后一次电话中同尼诺伊说话的情形。她回忆当她知道他死讯时的震惊和她眼见这么多的人民前来哀悼表明她和孩子们并不孤单，而尼诺伊也没有白白死去，她为此而感到安慰。如果她和孩子表示出勇敢，因为这是尼诺伊期望她们这样做的，也因为她们信仰上帝。“尼诺伊爱人民，现在轮到菲律宾人民爱你。”弥撒由几家无线电台实况广播。

然后她和阿基诺一家人以及科胡昂科一家人走在行列之前。据记者报道，送葬的行列在全国五千五百万人中，有二百万人参加。葬礼从上午十时三十分开始。灵柩放在十轮卡车上，四周放满花圈和黄色向日葵。所以使用大卡车是因

为柩车在列队进行时，哀悼者爬上车顶而损坏了。人民在黎明前就开始在路两旁列队。科丽坐着丰田卡车，支持者步行尾随二十英里，送葬行列走了十个小时。

黄和黑色的飘带系在建筑物上、树梢上和混凝土的桥上。群众也系着飘带持着黄花和举着有尼诺伊照片的标语牌。他们高喊和歌颂尼诺伊的名字，在大雨中淋了几个小时不散。那天夜间应尼诺伊家族的要求，许多人关上电灯、点上蜡烛、击锅和吹号角，使全城响成一片。

到了墓地，人民象波涛那样涌向前面，为了最后看遗体一眼。科丽要求他们稍往后站。她感到精疲力竭而且头晕目眩。这是因为没有进食所致。可是她想，“我一生没有昏倒过，我不愿此刻昏厥过去。”尼诺伊还是穿着他被害时那件血染的衣服。下午九时，尼诺伊最后安卧在马尼拉公墓长满青草的小丘顶上有水泥拱顶的平台上。一支号角吹起“息灯号”。

眼见尼诺伊遗体缓缓往下放进墓穴，科丽流下了泪。然后多伊·劳雷尔把盖在红柳桉木棺木上的菲律宾国旗交给科丽，劳雷尔是扶棺人之一。

后来，她丈夫的兄弟保罗·阿基诺认为她很镇静，很坚强。他看到她只哭了两次。一次是她回到家的晚上，另一次是在棺木下葬时。

科丽在牛顿已经哭得很多。她感到眼泪会搅乱孩子们的心，而使别人不安，而且她相信，一味的哭是无济于事的。